

## 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解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文本

Fred E. Schrader (史傅德)

卡尔·马克思是通过他的出版物以及 1844 年和 1857/58 年手稿而不是通过他的众多的手稿为人所知的。而这些手稿所依据的资料来源在 19 世纪末就已经上被遗忘了，他提到的大量史料在今天基本不为人知，就连引发马克思思考的源头问题也成了禁忌。即使自 1990 年以来，陆续收入马克思手稿的新版《马克思全集》(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以下简称 MEGA<sup>2</sup>)<sup>1</sup> 出版后，这方面的情况也没有得到多少改善，至今几乎未见对这些文本本身的研究。人们还在空论。马克思指挥着一个大型交响乐团，可人们不听乐器的声音，却在争论乐谱。

马克思大部分手稿集中在 1850-1883 年间，其中绝大多数都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有关，为撰写《资本论》做铺垫。这个讲座集中探讨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手稿研究的问题及其著作、手稿中反映出的他的思考的持续性、演变以及困惑。恩格斯在 1820-1895 年间的工作可视为与之平行和互补的资料。研究的依据是马克思的著作、已整理出版的马克思的手稿和尚未出整理出版的原文手稿。马克思还涉足其他领域，如数学、自然科学、农学、农业化学，还有民族学和世界史等等，这里不做探讨。

预先说明并强调两点：这个讲座只关乎马克思本人的原文著作和手稿，不涉及任何类型、任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有其自身悠久而复杂的历史，应另加以讨论；也不涉及以马克思的思想为基础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卢卡奇、阿尔都塞等等）和对马克思著作的译介。

### 版本问题

面对中国学者，关于马克思手稿的形式、涉猎的领域、马克思的工作方式和早期研究以及手稿的编纂和出版等问题，本人已在“实际工作中的马克思”<sup>2</sup> 一文中以及座谈、访谈中详述，有兴趣的读者找来可参阅，在此不赘言。这里只为方便完全不了解马克思手稿的读者就版本问题做一下简单的回顾。

我们知道，有马克思生前发表的著作、恩格斯整理发表的马克思的著作，然后就是马克思遗留的工作笔记。这就产生了版本问题。马克思去世后，恩格

斯将全部手稿转交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李阿扎诺夫（Ryazanov）领导的莫斯科马列研究所、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和法兰克福社会科学研究所就已计划出版包括手稿在内的马克思文集 42 卷，在斯大林统治下，文集出版 13 卷后搁浅，李阿扎诺夫等人在大清洗中消失。但是莫斯科马列研究所仍在 1939-41 年出版了 1857/58 年《政治经济学大纲》手稿。1956 年，东德马列研究所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arx-Engels Werke MEW）收入了马克思 1844 年和 1857/58 年手稿，但遵从共产党的意志，其余手稿均被弃置。

从 1975 年起，MEGA<sup>2</sup> 出版计划开始实施，计划无筛选地出版全部手稿。1990 年后，该项目由无党派的阿姆斯特丹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nternational Marx-Engels Stiftung IMES）继续执行。手稿存放在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IISG），出版工作则在柏林布兰登堡科学院（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BAW）进行。1957 年以来，马克思手稿大约 50 卷就已逐渐被详细描述并可供公众查阅。1975 年以来，特别是 1990 年以来，MEGA<sup>2</sup> 已经整理出版的著作和手稿以及未出版的手稿均可在互联网上查阅<sup>3</sup>。2016 年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了 MEGA<sup>2</sup> 所有已出版的著作。

## 一贯性与演变

人们总是强调马克思思想的一贯性，但其实他的思想也在演变。19 世纪 40 年代的青年马克思倾向于青年黑格尔派、西尔纳（Sirner）和费尔巴哈，主张社会条件或社会关系的经验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社会条件是首要的，而思想则依赖于社会物质条件。成熟的马克思则认识到，价格、财产、利润、利息等某些抽象概念不仅是资本再生产的结果，而且是资本再生产的先决条件，没有资本再生产，这个市场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在这方面，他纠正了自己早先对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

1850 年以前，青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观点大致相同，即认为历史上所有已知的社会都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特征的，包括而且尤其是现代公民社会。这是由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自身劳动能力的所有者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之间的不同所决定的。阶级对立表现为不同形式的收入：工资、利润和地租。然而，

早在 1850 年，马克思在伦敦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就指出，货币形式模糊并抹杀了一切收入之间质的差别。后来的《资本论》第三卷也是以完全相同的表述结尾的。然而，在这期间贯穿着复杂的研究过程，这个研究过程多次改变了问题并使得问题更加复杂。这主要涉及马克思对社会抽象概念的批判，因而也涉及其唯物主义的基础。

马克思在西欧和北美工人运动中与其当时比他更强大的社会主义思潮抗衡：欧文主义者、伯明翰主义者、拉萨尔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圣西门主义者。除了巴枯宁主义者之外，所有这些思潮都致力于通过改革货币制度，尤其是通过革命性的银行制度来进行社会革命。为此，蒲鲁东寻求与拿破仑三世建立密切关系，拿破仑三世公开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和圣西蒙主义者，并推动相应的银行项目。马克思想要并必须证明，这属于资本主义的内在性。

## 政治经济学批判

政治经济学批判一般是指马克思为撰写《资本论》所做的研究。这是一个极其繁复的过程。仅《资本论》第一卷就至少有七个不同的版本（1857 年、1859 年、1867 年、1872 年、1872-75 年、1883 年、1887 年；还有 2017 年托马斯·库钦斯基 Thomas Kuczynski 在汉堡协调编辑出版的版本）。马克思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还想以第三卷为基础重写《资本论》。

马克思从 1850 年流亡伦敦开始，也就是 32 岁时，就接受了政治经济学的熏陶，同时也具备了完整的哲学史知识。如果我们查阅 1850-1857 年间他的前 23 本工作笔记，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内容：马克思也谈及“经典”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但并不多（仅在 1857/58 年大纲的第七册的摘录中）。他讨论的约 300 种著作几乎都是“次要”作者的出版物。其中有一些作者甚至被马克思认为比“经典”作者更重要。如果不了解这些作者，很难理解 1867 年《资本论》出版之前的马克思的研究。在此之前，马克思已经研究了大约 500 本专著。

马克思并不是在思考超越时空的理论问题，而是密切关注他那个时代关于经济政策的辩论，尤其是围绕经济危机的经济政策的辩论：1711-20 年法国经

济危机、1716-20 年英国经济危机、1790-97 年法国经济危机、1799 年汉堡经济危机、1815 年、1825 年、1847-48 年英国经济危机、1837-43 年美国 and 英国经济危机、1857-58 年第一次全球经济危机、1873 年德国/奥地利经济危机。这就需要对货币和金融市场的运作有非常实际的了解，即不仅要了解工业资本，还要了解银行资本。

在马克思的 1850-67 年的工作笔记中，可以看到 19 世纪英国的政治辩论的焦点是货币和银行体系，尤其是纸币及其支撑问题。特别是在首相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领导下，英格兰银行于 1844 年受到监管。《银行宪章法》限制了新纸币的发行，要求纸币必须以黄金为支撑。如果纸币发行过多，就会导致通货膨胀。纸币的数量只需与商品的数量相比较。与相同数量的商品价值相比，货币越多，意味着价格越高。这是自李嘉图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货币学派的理论（但在更早的约翰·洛克 John Locke 或大卫·休谟 David Hume 等人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这一论点，作为反对重商主义的论据）。

与此相反的是少数银行学派，由银行家托马斯·图克（Thomas Tooke）和纽马奇（Newmarch）、伦敦政治经济学俱乐部（Political Economy Club）的富拉顿（Fullarton）、《经济学人报》的威尔逊（Wilson）等人主导。他们认为货币学派把问题简化了。一方面，90-95% 的贸易根本不是使用纸币进行的，而是通过汇票、债券和账户结算进行的，是资本之间的交易。然而，流通纸币是收入的形式，尤其是工资，可以兑换食物，然后通过经销商返回银行。这些纸币的数量受到购买力的限制。另一方面，如果银行向企业家发放贷款，这笔钱最终会回到银行。实际上，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乡村银行发行没有黄金或白银支撑的纸币，不会造成通货膨胀或支付困难，这不会导致经济危机。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研究了经济危机是如何产生的。

1851 年马克思的第一辑第七号工作笔记中有一篇评论，题为《反思》。在这篇评论中，马克思同意图克的观点。他把图克称为“朋友”（实际上他们并不相识），认为他是最后一位有价值的英国经济学家。马克思通过图克指出，商品和货币的流通量并不是简单的流通，那样毫无意义，而是构成资本：

“一方面是经销商与经销商之间的贸易区别，另一方面是经销商与消费者之间的贸易区别，第一次是资本转移，第二次是收入与资本的交

换……——这一区别对于亚当·斯密和图克来说很重要，正如早些时候金银报告委员会所强调的。”<sup>4</sup>

此文早在1980年就已发表，后来也收入MEGA<sup>2</sup>。迄今为止，包括马克思主义文献在内的学术研究没有对此回应。为什么？因为今天，世界范围内除了少数专业研究人员外，很少有人了解英国货币、金融和银行政策的历史。而屈指可数的研究人员也不会把他们对图克等人的了解与马克思联系起来。然而，马克思本人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C节中概述了黄金、货币、商品和资本的理论史，之后才打算研究信用货币及其“活跃的关联”，随后在《资本论》第三卷正稿的第五章中对此进行了阐述。在编辑《资本论》过程中，恩格斯多次说明他由于不了解图克、富拉顿和其他人的著作而遇到的困难。<sup>5</sup>

马克思在他的所有著作中始终坚持这一论断，还有这种对图克的定位。马克思在1866年手稿中简短概括了这一中心论点：“所有困难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商品不是简单地作为商品交换，而是作为资本的产品交换……”<sup>6</sup>

自1851年以来，马克思面临的问题一直是如何有机、系统地描述这一点。这是因为，社会实践中常用的术语并不明确，而是模棱两可的。货币的涵义大于货币，但同时又小于货币——这取决于精确的功能关系。这个资本主义市场社会是混乱的，但仍以某种方式维系在一起。如何才能连贯地呈现这一切呢？

### “理想主义的表述方式”

这是马克思在1857年与圣西门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达里蒙争论时的一个发现。在这个社会中，任何地方的一切事物都被每一种经验意识赋予了理想的交换价值或价格形式。马克思称之为“理想加倍”。他解释道：“说到工作方法，我偶然……又翻阅了黑格尔的《逻辑学》，这对我大有裨益。”<sup>7</sup>

事实上，这是一种研究黑格尔的新方法，与早期以费尔巴哈为导向的抽象唯名论批判几乎没有共同之处。通过简单的比较阅读，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其系统设计中借鉴了黑格尔的哪些构架思路。马克思设想从价值通过商品和货币手段到资本及其再生产过程的逻辑发展，表现为一个不断扩展的螺旋圈。这样的结构被认为是必要的发展过程，已经符合“逻辑”。具体而言，马克思从

价值到资本的逻辑发展是通过定义价值概念和金钱概念进行的，这里金钱被当作价值尺度、交换和流通手段、一般支付手段、世界货币和财富。

这些功能定义本身并不新颖，马克思是分析西斯蒙第（Sismondi）、斯托奇（Storch）、萨伊（Say）、贝利（Bailey）和威尔逊等人的著作时获得的。马克思的独创在于他将这些功能作为概念定义系统地联系起来：价值/交换价值对应于黑格尔的纯量（负统一），价值尺度包含了黑格尔对数量关系和尺度的确定，马克思用质与量的不良而无限的过程来描述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从货币到资本的过渡反过来表现为从存在到本质的过渡，而马克思首先把资本本身概括为一个渐进的量。

马克思的问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借助黑格尔的概念定义，他能够将价值、商品、货币和简单流通的功能相当连贯地相互联系起来，把它们表述为处于一个符合逻辑的发展过程中。然而，在把资本的一般概念理想地描述为一个数量递增的过程时，资本、货币、商品和价值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以及它们应该如何在其中相互抵消，就不清楚了。问题就在于马克思在逻辑上相互关联的概念定义的事实含义以及他所设想的发展过程的必要性。<sup>8</sup>

马克思对斯宾诺莎的借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们从马克思处理实体概念的方式中，可以相当准确地追溯这一发现过程。一开始，他在反复尝试形成资本的一般概念时指出：

“在资本中，交换价值只是由于它在流通中保持自身这一事实才被确定为交换价值，也就是说，它既没有变成非实体，而总是在其他实体中、在实体的整体中实现自身，也没有丧失其形式的决定性，而是在每一种不同的实体中保持自身的同一性。因此，它始终是货币，始终是商品。”<sup>9</sup>”

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地谈到了完全在黑格尔意义上的实体的总体性，即作为纯粹累进量的价值的表现形式。这也决定了尝试使用以下概念：“资本在其概念上是货币，但货币不再是金银……的简单形式，而是所有实体的形式……”

但是，马克思接下来又颠倒了这种概念关系：

“一切商品的共同实体，也就是说，它们的实体又不是它们的物质实质，即物理决定性[如上，作者注]，而是它们作为商品因而作为交换价值的共同实体，因此是物化的劳动……这种使用价值的（社会）经济实质，即它们作为内容的经济决定性，与其形式不同……<sup>10</sup>”

这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不再是一个单纯的量，而纯粹的量又被更精确地定义为抽象劳动的量。正如马克思足够明确地表述的那样，抽象劳动作为理想的主体/客体的实体和社会再生产整个过程的理想，所有的时刻和因素、所有的个别过程都有可能作为其具体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模式重置于这个过程中并融入其中。<sup>11</sup> 马克思的自我认识语境中发生变化的是对实体概念的内涵的界定。实体概念失去了纯粹物质的琐碎。从此，对马克思来说，构成资本的是作为“创造价值的要素、价值的实体……和价值增值的实体”的抽象劳动。<sup>12</sup>

不过，马克思也提出了保留意见：

“以后有必要纠正……唯心主义的表述方式，这种表述方式造成了一种表象，即这只是这些概念的定义和辩证法的问题。因此，最重要的是：产品（或活动）变成商品；商品变成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变成货币。<sup>13</sup>”

必须避免出现价值的理想存在、货币的超验力量和概念的主导地位。但是，关系只能通过概念来分析并表达。马克思在 1859 年以后的著作中，更强调作为构成要素的社会关系：“社会不是由个体组成的，而是表达这些个体彼此之间的关系的关系的总和。<sup>14</sup>”

然而，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马克思承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理想意识形式中的现实功能。这不简单是一个虚假意识的问题，而是在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功能背景下必然存在的虚假意识的问题：

如果说……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真实的内在联系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是一项庞大的工作，如果说把仅仅是现象的活动简化为内在的、真实的活动是一项科学工作，那么不言而喻，在生产和流通的资本

主义代理人的头脑中，一定会形成关于生产规律的观念（!!!），这些观念与真实的生产规律完全不同，只是表面活动的意识表述。商人、股票投机者、银行家的观念必然（!!!）是完全错误的。生产商观念则被其资本所经历的流通行为所篡改……<sup>15</sup>”

## 再生产的整体过程

马克思研究的核心是对 1847 年和 1857 年世界经济危机议会调查委员会的分析。委员会采访了企业家、实业家、银行家、科学家和政治家（1848 年商业困境秘密委员会的第一次报告、1848 年上议院秘密委员会的报告、1857 年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1858 年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议员们反复提出同一个问题：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金钱是作为货币、流通手段，还是作为资本？没有一个总体、明确的答案。例如对洛伊德/奥弗斯通（Loyd/Overstone）在采访：

（问题 3736）“我注意到阁下说金钱是获得资本的工具……在金银外流的情况下，资本家获取金钱不是反而面临巨大的压力吗？”

“不，不是资本家，而是那些不是资本家的人想要获得金钱；他们为什么想要获得金钱呢？……因为通过金钱，那些不是资本家的人获得了对资本家的资本的支配权，以便开展商业活动。”

（问题 3737）“开出汇票的人难道不是资本家吗？”

“开出汇票的人可能是资本家，也可能不是资本家。”

（马克思批注：“此时他像热锅上的蚂蚁。<sup>16</sup>”）

马克思解释说，这取决于行为者的立场和观点：“对 A 来说”，“在 B 的想象中”，“在 C 的意识中”，“在 D 的观点中”，等等。但是，在每一次买卖行为中，金钱都是货币、支付手段或一般商品，而整个过程都是由资本流通推动的。换句话说，对一个人来说只是购买手段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就是已兑现的资本。对一个人来说是货币资本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是预期利润和预期再投资。这些思维形式相互矛盾，但又并存。<sup>17</sup> 由此不可能产生一个总

体性的描述，类似于上帝模式，或理想的总资本。如果一些经济学家，如海因里希·施托尔希(Heinrich Storch)或西蒙德·德·西斯蒙尼(Simon de Sismondi)试图这样做，马克思则认为这是形而上学的。在他看来，这种“活跃的关联”在经验上是存在的，但却无法理解，只能用劳动价值论来描述。但是，整个体系的成功恰恰在于经验意识不可能理解并概念化资本再生产的整个过程。

这个问题在民族学中是众所周知的。民族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写道：

“然而，我们必须记住，在我们看来广泛、复杂而又井然有序的制度，是野蛮人众多行为和追求的结果，他们没有明确的法律、目标或章程。他们对自己的社会结构的总体轮廓一无所知。他们知道自己的动机，知道个人行为的目的和适用于他们的规则，但整个集体机构是如何形成的，这超出了他们的思维范围。即使是最聪明的当地人，也不清楚库拉是一个有组织的大型社会建构，更不清楚其社会学功能和含义……整合观察到的所有细节，对所有不同的相关迹象进行社会学综合，是民族学学者的任务……民族学学者必须构建大型机构的图景，就像物理学家从实验数据中构建理论一样，这些实验数据总是触手可及，但需要一致的解释。<sup>18</sup>”

有两个问题始终存在。一方面，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整个过程只能用单一的资本、封闭的企业、封闭的组织来描述。例如，这已经适用于通过抽象劳动或工作时间来确定价值。但公民社会，即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组织。因此，这种描述充其量只是一种类比。另一方面，这个社会是通过经验形成的某些意识形式在运作的，如价格、工资、利润、信贷和利息等。价值和资本等理想概念可以被这些内在的功能概念限定，但不能被直接固定下来。马克思表明，这些概念缺乏有机的、系统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在经验上确实存在。同样，资本主义市场社会的社会替代品也无法通过其自身的经验意识来设想。这总是会回到资本主义的内在性——或者说是反乌托邦。马克思所拒绝的东西，也是他之前的黑格尔、康德和卢梭等强调系统性的理论家所拒绝的东西，在这里变得重要了：能够漂移和进化，甚至进化飞跃的历史混合物。

## 结论：

利润和利润率的社会产生本身不能用经验主义企业家的概念来解释，只有在假定剩余价值的社会生产来自于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时才能解释。然后“一切就都清楚了”。然而，这恰恰导致了马克思所担心的结果：不可能在全社会层面从剩余价值中推导出经验利润，因为分析家可用的术语和逻辑不足以做到这一点。这些术语和逻辑已经为具体社会实践本身所占用。

马克思认为，一方面，从经验的商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以及最终工业资本家的必然虚假而自相矛盾的意识形式中，无法构建出整个过程的客观表象。他只有回到资本主义价值生产的“真正的”、“原始的”定义，即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才能找到解决办法。<sup>19</sup> 另一方面，这种抽象劳动显然只“理想地”存在，只存在于政治经济学分析家、批判家的“想象中”。<sup>20</sup> 这种抽象劳动作为一种实体只存在于“自身之中”，是字面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量。整个社会过程的表现形式只能从其先决条件中推导出来，而不可能从其内部推导出来。因此，不可能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也就是公民社会中使用的各种概念来解释整个公民社会本身是如何运作的。

因此马克思发现他陷入了僵局：“商品按其价值出售。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在现实中……各行业平均利润率的差异并不存在……因此，价值理论在这里似乎与实际活动不相容，与生产的实际现象不相容，因此必须完全放弃价值理论才能理解后者。<sup>21</sup>” 价值理论和“现实活动”只有在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用资本主义术语表达”——才是一致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价值理论和“现实活动”就分道扬镳了。<sup>22</sup>

我们现在明白了，为什么马克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要根据这一结果重写《资本论》。我们也理解了恩格斯所承认的编辑第三卷时的困惑。从经验型个体企业家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解释确实显得难以理解。因此，恩格斯在编纂《资本论》第三卷时，在文本中进行了干预，以确立个体生产资本家的实用主义视角。然而，马克思数十年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方面的研究成果——认识论问题——却在这一编辑过程中遗失了。而认识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附属品。

认识论问题说明了参与者和分析者何以都不了解经济危机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从 1848 年到 2024 年，这方面没有任何变化；认识论问题显示出内在货

币和金融政策的局限性；认识论问题说明意识形式是虚假的、有限的，但意识的形式恰恰在其有限性和矛盾中是功能性的；认识论问题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排斥和过度开发：“（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损害了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乡村劳动者的智力活动，而且还扰乱了人与地球之间的物质循环，使土地越来越难以获得再变得肥沃的元素，即从大地夺走的并以食物和衣服等形式消耗掉的化学成分。<sup>23</sup>”最重要的是，历史的非同步性和混合状态在这里发挥了作用。

自卢梭以来，公民社会理论一直偏爱系统性的描述，对他们来说历史描述是陈腐的。但只有历史可以提供解决方案。历史上还发生过其他进程。19世纪和20世纪发生了激进的政治性的土地调整与合并（近代以来驱赶农民、圈地、清拆的做法已经是其中的一部分）。事实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贯穿着封建社会的多种形式。这种发展只能如此进行，因为没有其他手段可以利用，必须穿插使用自身的元素，并且模棱两可地运作。这在任何地方，都不是连贯而系统的逻辑，甚至在北美也不是。在那里，一个新成立的共和国是用历史预先确定的政治形式发展起来的，但这恰恰训练了经验主义的商业头脑，使其能够在实践中成功地应对这种难题。

年轻的马克思期待着从这种矛盾中产生革命动荡。然而，20世纪各种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经济并没有得到合理而有计划的组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碎片则一次又一次自然地重新组合。即使在巴黎公社之后，年长的马克思仍然认为，在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可以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建立工人阶级反对资本的力量（1872年9月8日在阿姆斯特丹的演讲）。可以想象建立新的社会和政治混合体，但不能用市场经济社会，即公民社会本身的概念来设想。

马克思著作与手稿的研究远没有终结，而是开放的。可以利用新的数学、科学、逻辑和社会学方法继续这一研究，例如使用系统论（由福斯特 Foerster、冈瑟 Günther、马图拉纳 Maturan、斯宾塞-布朗 Spencer-Brown 等人提出的）。

研究马克思的手稿不是政治、意志、金钱、融资的问题，而是科学资质的问题。学会辨认马克思的笔迹也并不难，但要阅读和理解马克思运用的资料，像马克思那样掌握17至19世纪的政治、经济和哲学史，并用至少七种语言阅

读，就需要百科全书式的训练。总之，缺乏的不只是资金，而更是历史知识、技术训练、人文主义和启发性的思考。

2024年1月 巴黎

（晨枫 译）

注释：

<sup>1</sup> MEGA<sup>2</sup> 计划出版著作及其手稿四大部分共 114 卷，现已经出版 73 卷。第一部分 32 卷是以及重新修订的已出版过出的著作、文章，已经全部出版；第二部分 15 卷，包括《资本论》及其 6 部政治经济学手稿，已全部出版；第三部分是通信 35 卷，已经出版了 13 卷；第四部分包括笔记，已出版 13 卷，其中绝大部分涉及经济学，其余涉及科学、农学、哲学、历史、政治、外交、数学、语言学等等。

<sup>2</sup> 史傅德，“实际工作中的马克思”，《中国学术》，商务印书馆，2004 年，34 期，第 1-27 页

<sup>3</sup> 手稿档案网站（IISG）：

[https://search.iisg.amsterdam/Record/ARCH00860/ArchiveContentList-MEGA<sup>2</sup>](https://search.iisg.amsterdam/Record/ARCH00860/ArchiveContentList-MEGA2)（BBAW）网站：

<https://mega.bbaw.de/de/struktur/>

<sup>4</sup> 工作笔记第七本，档案 B54

<sup>5</sup> 见恩格斯：1884 年 6 月 21 日、1889 年 7 月 4 日、1892 年 9 月 12 日、1893 年 2 月 24 日通信；《资本论》第三卷序言

<sup>6</sup> MEGA<sup>2</sup> II, vol. 4. 2, p. 251.

<sup>7</sup> 1858 年 1 月 16 日给恩格斯的信

<sup>8</sup>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1857/58)（《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MEGA<sup>2</sup> II, vols. 1. 1 & 1. 2., p. 29.

<sup>9</sup> 同上，p. 33

<sup>10</sup> 同上，p. 33

<sup>11</sup> 同上，p. 34

<sup>12</sup> 同上，p. 34

<sup>13</sup> MEGA<sup>2</sup> II, vol. 1. 1., p. 188.

<sup>14</sup> 同上，p. 188.

<sup>15</sup> MEGA<sup>2</sup> II, vol. 4. 2, p. 385f.; Kapital I, MEW25, p. 324 sq.

<sup>16</sup> MEGA<sup>2</sup> II, vol. 4. 2, p. 491.

<sup>17</sup> 同上, p. 588 f.

<sup>18</sup> Bronislaw Malinowski,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Londres, 1922, pp. 83-84.

<sup>19</sup> *Kapital* III, MEGA<sup>2</sup> II, vol. 4. 2, p. 385f.

<sup>20</sup>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1857/58) , 同上,  
p. 75.

<sup>21</sup> MEW 25, p. 162; MEGA<sup>2</sup> II, vol. 4. 2, p. 229sq.

<sup>22</sup> MEW 25, p. 186; MEGA<sup>2</sup> II, vol. 4. 2, p. 251; MEW 25, p. 189, 197, 324,  
648, 657, 853.

<sup>23</sup> *Capital* I (法语版), 1872, in Thomas Kuczynski, *Das Kapital*,  
Hambourg, Note p. 547.